

萧一山

撰

清史大纲

杜家骥 导读

蓬

莱

阁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萧一山

K249
X365

撰

清史大纲

蓬

莱

阁

丛

书

杜家骥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大纲/萧一山撰;杜家骥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

(蓬莱阁丛书)

ISBN 7-5325-4250-5

I. 清... II. ①萧...②杜...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927 号

蓬莱阁丛书

清史大纲

萧一山 撰

杜家骥 导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625 插页 5 字数 208,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5325-4250-5

K·791 定价: 1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有“汉家石渠阁,老氏蓬莱山”之称,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

《清史大纲》导读

杜家骥

摆在您面前的这本《清史大纲》，1944年由重庆经世学社出版，次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易名为《清代史》。作者萧一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蜚声史坛的清史专家，其成名之作是早于《清史大纲》之前20年左右出版的多达200万字的《清代通史》^①。了解《清史大纲》，首先有必要对萧一山其人以及奠定其清史学基础的大作《清代通史》及作者其他有关的清史研究成就作一简单介绍。

一

萧一山(1902—1978)，江苏铜山人。自幼受教于为塾师的父亲，习四书五经。1915年考入山东省第七中学，1919年毕业，入山西大学预科，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萧一山中学时代即喜文史，耽读先秦诸子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名著，入北京大学不久，即由政治系转入历史系。在他中学时期，正值日本人稻叶君山(原名稻叶岩吉)所著、但焘翻译的《清朝全史》出版(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该著为第

一部以章节体撰写的清代全史,当时影响很大,萧一山深以国人未能写出清史为耻,因而在考入北京大学以后,便于课程学习之余,广阅史籍,钻研清史,发奋著述,终于撰成章节体《清代通史》上卷,由清入关前至雍正朝,约56万字,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当时萧一山还是个年仅22岁的大学生,撰成如此著作,学界为之惊讶。名流大家诸如李大钊、蒋梦麟、李泰棻等均予赞誉、鼓励,李大钊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史学要论”,读了《清代通史》上卷初稿,并应邀作序,序中称该书“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蒋梦麟作序,称赞该书“取材宏富、叙述详确”;日本教授今西龙当时正作客北京,也作序褒扬萧一山“能将浩瀚的旧史料融化成自己的东西,又加上许多新史料,并且记叙也安排得宜,详而且确,实是从来未睹的佳作”。萧一山受到前辈名学者们的奖掖,更加意气风发,加紧其《清代通史》的撰写,大致在1924年底,又完成了《清代通史》中卷的撰写,此卷内容由乾隆迄道光末,约60多万字,192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25年,萧一山在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他的才华,受到当时鼎鼎大名的梁启超的赏识。梁推荐他到清华大学共讲中国通史,自己授文化部分,萧一山讲授政治部分。1927年,《清代通史》的上卷与中卷均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梁启超欣然为序,颇有感慨地讲道:“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

1928年,萧一山创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并任院长,1930年,又将他在该院讲授清后期历史的讲稿十章,交北平文史政治学院作为讲义印行,为《清代通史》下卷。

1932年12月,萧一山赴海外考察政治,同时搜集历史资

料,中经英、德、法、意诸国,后转途日本,1934年2月回国。此次海外之行,萧一山搜集到不少流落到西方的有关太平天国及秘密会党的史料,回国后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刊行。

海外考察政治归国后,萧一山的治学思想有很大改变,大力提倡学术“经世致用”,并于1937年1月创办《经世半月刊》。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重庆成立经世学社,萧一山被选为理事长。其间,萧一山几次在《经世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学界唤起民众的民族精神,团结抗战,以达到中华民族建国复兴之目的。抗战期间,萧一山又先后出任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任教东北大学时,完成《清史大纲》、《曾国藩》二书的写作。而这两部书,也正贯穿了他强烈的民族革命观点和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一山的主要活动是在政界,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1948年底到台湾后,曾在政治大学任教授,五十年代末,又出任过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台期间,萧一山对他的《清代通史》作了修订与增补,196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共5大册,前4册为正文,内容由清入关前至宣统逊位,共360万字。第5册为附表,约40万字。共约400万字。他的《清史大纲》也改名《中国近代史概要》,由三民书局于1964年出版。1978年7月,萧一山在台湾举行的“清史档案研讨会”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萧一山的代表作《清代通史》堪称内容宏富,内容也较全面,诸凡政治、财政、军事、学术文化、中外关系、边疆民族、地方社会等等方面,均叙事详尽且清晰。《清代通史》上、中、下

卷的基本构思及写作,均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受到资料的限制。如《清实录》,当时不能利用;大量的清宫档案,当时也只能见到极少的一部分。这是该书资料上的缺陷(后来作者在台湾期间又对此书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改)。再有,作者在材料的选择上也有不够严谨之处,甚至引用传闻,以致出错。对当时人的批评,也未能虚心接受改正。迨至《清史大纲》写作的四十年代,其史料来源已经扩展,对某些问题又有了专门的考察,如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及洋务运动等,更兼作者有大部头《清代通史》的清史学基础,所以现在所要介绍的这部《清史大纲》也自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

二

《清史大纲》共 10 章 40 节,约 20 万字。以 20 万字叙有清一代历史,若求全面系统,那各方面的内容只能是蜻蜓点水。由于此书并非以前其大部头、全史性的《清代通史》的缩写本,正如作者所谓“非其缩影,二者实可相辅行也”(《后记》),因而在内容上有所侧重,其中也不乏详细之处,有些内容甚至是现在一般章节体“清史”所没有或很简略的。如第四章中《人民的生活及习俗》一节,作者便旁征博引,详述各阶层人之日常食用开销、生活水平,以及南北方之差异。另外,还分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介绍不同地区、不同身份地位之人的状况。此章的另一节《城乡社会之组织》,则列举城、乡名目繁多的基层组织,如乡、里、区、社、坊、镇、铺、厢、村、庄、寨、堡、圩、都、图,以及各单位头面人物、负责人之选举,保甲、乡约、宗族组织,以及地方基层的公众活动及管理等等。

萧一山在这部《清史大纲》中,主要是表达他的“民族革

命”观点,因此,这方面的内容占据了此书的一半以上,是《清史大纲》的主要侧重点,甚至可以说,这一观点是他这部书的“纲”或“主线”。作者从世界发展的大势着眼,把反对外侮的民族革命作为中国具有近代性质的特点内容,以这一内容为时间断限,作为他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在他的观念中,满族入主中原,也属于异民族统治,因而民族革命也应从反异民族、反“满清”开始。他把民族革命的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我们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目的是‘反清复明’。因为满清宰制中国,在当时是异族,本于民族主义的观念,是要抵抗驱除的”。第二时期,“我们民族革命的对象,不是满清的帝国主义,而是列强的帝国主义了”,这一时期,无论朝野,“都孜孜以救亡图存为事,提倡自强运动、维新运动”。由于“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钐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因而才有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第三个时期又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民族革命的对象是列强的帝国主义,后一段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上所引均见此书的《引论》)正是基于上述观点及其所侧重的民族革命的主线,此书在第一章叙满族入主中原后,第二章便以《民族革命之酝酿》为题,述“革命运动之倡导者——郑成功”,介绍郑成功如何复明抗清,以及此后的天地会及以朱三太子为号召的反清复明活动。其后的第六章《民族革命之壮澜》,又以一整章的篇幅,从民族革命的角度,详述太平天国之产生背景、兴亡过程,以及它的意义影响。而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则都是关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边疆之危机、中日关系及甲午战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自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等史事叙述,贯

穿了国人自强御侮的“民族革命”主旨。通计此书 10 章中的 7 章都是关于“民族革命”的内容,其中又以鸦片战争以后的内容居多,以篇章计,占 10 章中的 6 章,以字数计,亦占 60%。这一阶段的历史,按照现在我们的一般分期法,是把它归为中国近代史。由于这一阶段的历史在这部《清史大纲》中所述还比较详细,作者对史事也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其中也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另外,有些内容还是作者利用新资料研究的成果,或是作者曾做过的专题研究,因而具有值得注意的价值。

作者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极高评价,称其“意义非常重要,它的影响相当长远”,对后来的辛亥革命有“先机之启示”,赞誉“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种共产制度”,认为洪秀全代表贫农阶级,《天朝田亩制度》规划理想的社会,具有进步的思想,并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一项,也是受了它的影响”,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革命“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第六章第一节、第四节)。另一方面,作者对洪秀全等人的不光彩事迹及这场运动的缺陷,也予揭示。在介绍运动发展的内容中,作者利用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赛尚阿奏折附单的洪大全供词(这份供词也曾见于邸抄,并被译载于法国人卡勒与伊凡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以及法国人《中国叛党起源志》中所述“天德”皇帝事迹与所附像,介绍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曾有直接承袭天地会势力、首举革命义旗的“天德皇帝洪大全”,后来汇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又据洪大全供词称:洪秀全“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太平王,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但不久,因两会矛盾,天地会党人多脱离出去,洪大全亦被洪秀全、杨秀清等排挤陷害,以致最后战败被赛尚阿俘获(以上见第二节

《太平天国之前驱》)。这段史事,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看出作者对其所赞誉的洪秀全及其领导的运动不“曲笔”,而是全面客观地反映。在这方面,作者还指出“洪秀全的智识太差,没有驾驭群雄的本领”,因而“他们的内讧也是当然的,无可避免的”。洪秀全“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极低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个人主义,尽量发挥,自称为上帝之子,国宗皆特殊阶级……他们很严格地禁止男女混杂、夫妻会合……而高级人员征歌选色,广蓄姬妾,洪秀全在永安就有三十六个女人,以后就更不必说了……可见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没有一定的方向,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哪能成大事?”洪秀全反孔而尊崇基督教,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史实,但他的思想后来有所转变,萧一山根据他搜集的散佚的太平天国史料,揭示了这种转变:“后来他才明白了这种道理,将中国的典训增入宣传品中,《太平诏书》所加特多,并托为天父降凡说:‘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土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可惜时间太晚。”(第六章第三节)

对湘军、淮军之不同处与组建者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以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作者从多方面详细地表述了他的独到见解。作者认为,曾国藩是孔孟之道修养颇深之人,其湘军将领,也多为儒生,所以“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卫乡卫国,必忠必信。将领都没有功名富贵的念头”。并以曾国藩之视高爵厚赏为“秕糠尘垢”、彭玉麟之坚辞巡抚总督,以及罗、李、王诸将之只有事业心而无功名心为例说明。而淮军,作者认为,其将领只有潘鼎新是举人,

其余非盐梟即团练、守备之流，出身微贱，根本谈不上学术，岂能有湘军罗、李、玉、彭的气概？“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而可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作者又指出湘、淮军饷制也有所不同。湘军军饷计划周密，且精神纪律好。而淮军勇无宿储、官多挥霍，以致将战获物据为私有。李鸿章本人就不廉洁，所以淮军的风气很坏。前清末年官吏，出自曾国藩门下者皆比较正派，出自李鸿章门下者，则比较不醇。还有任人方面，作者认为曾国藩不循私情，不计恩怨，颇能拔擢真才，不愧一时领袖。李鸿章却不然，我们看他谏阻曾国藩奏劾李元度之事（元度与国藩曾同患难，李即以是为言，而曾未听，因此就离开国藩的幕府有一年），就知道二人的作风不同。后来李鸿章当政，凡四十年，自视太高，与其故旧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又好以利禄驱众，亮节之士，多不乐为用。湘军无割据自雄的企图，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军造成他的势力。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为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曾国藩在剿平太平军后，命李鸿章留淮军以平捻，把自己的湘军撤了，又重用满蒙旗人及其他省之人，可见他的襟怀。而李鸿章重视部属乡里，才造成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系，为中国军队添封建割据之观念，倘以湘军人物当他的地位，必不至于如此，这一关系国运的转变，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以上所引内容，均见第七章的第一、二、三节）。作者褒扬曾国藩及其组建的湘军，而对曾国藩及湘军某些将领的缺点未作揭示；对袁世凯活动的认识也不无可商榷之处（比如袁世凯之练新军与以前之淮军应有所不同），凡此，稍显偏颇，但他对曾、

李及湘、淮二军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则言之有理,独到、深刻。

作者虽然在湘、淮军之比较,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上,褒曾、贬李,但对李鸿章之办洋务以自强、抵外侮,又能以较平实的观点,作客观的记述和评价。

此书第七章专辟第四节《李鸿章及自强运动》,首先指出“李鸿章虽然替中国遗留下骄横自私的军阀,造成很坏的风气,但他支持晚清政局,身任外交的要冲,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接着又以较多的笔墨,列举李鸿章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年之间办理洋务的二十多件较大举措,分析他由创办军事工业,到设立学堂,派遣学生军官出洋留学以学习西方技术,进而建设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办船厂、电报局、筑铁路,再经办非军事的工业企业以增加经费收入,挽回利权等等,这一切因需要而逐步发展的状况,进一步评价“李鸿章认定中国要自强,非学西洋的科学机械不可,要事西洋的科学机械,非变更科举取士之法不可。他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以科学制造悬为富贵功名之鹄的”。还认为李鸿章很早就已认识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历史意义、以及此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赞誉李鸿章“实在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对时代认识最清楚。他并且再三的说这是‘中国二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我们适应这变局,必须赶快变法,才能自立于世界之上”。此节在作如上一番评论之后,又进一步阐述这种自强运动的不彻底性,所以始终未能达到救国家、救民族的目的,原因是办洋务者“都出身中国的旧社会,对外国的知识有限,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更不晓得文化、政治、经济一切都要配合起来,全盘计划,才能生效。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中用的。日本维新所派遣西洋的留学生,不仅学科学机械,而尤重政治法律教育各种制度,因此它的改革是普遍的,是全体一致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所处的环境,实在太顽固闭塞了”。李鸿章等不可能触动乃至否定君为臣纲的传统政治伦理,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而且受到守旧派的反对,萧一山进一步指出:李鸿章“对于旧社会的改革,稍稍致力,尚不免遭谤挨骂,忧谗畏讥,他能作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么”,“然而他们毕竟是中国维新事业的创行者,虽未达到自强之目的,却不得谓之失败”。

对于中日之战清朝惨败及始终参领其事的李鸿章的责任问题,此书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关于甲午战争前中日矛盾的焦点,即清朝与日本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问题,作者指出:“朝鲜的问题,李鸿章自始就特别注意,他认定日本对朝鲜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朝鲜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朝鲜的权利愈多,它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以后由于又有英、俄对朝鲜的争夺问题纠缠在一起。以致“李鸿章始终感觉着对朝鲜‘操纵两难’,对列强连日本在内,都不敢得罪,徘徊瞻顾,毫无主见,及事机既迫,仍然持重因循,着着落后,这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此后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李鸿章成为朝野舆论指责的对象。作者认为“其实李鸿章负不了这许多责任”,翁同龢、李鸿藻等朝臣痛哭流涕主战,但毫无办法,而又掣李鸿章的肘。如“甲午战前,李鸿章大阅海军,英人曾建议:‘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因介绍二舰售中国。翁同龢长户部,借口款绌,加以阻挠,后来这两只船为日本购去,其一就是打沉我船最多的‘吉野’”。作者还认为,这场战争,李鸿章是在孤军作战,而日本则是全国一致对外。外国报纸评论:“日本非与

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作者又引当时人梁启超的评论:“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作者评论:日本“明治天皇亲到广岛督师,宿将谋臣,全体动员。我们的帝后还天天受贺听戏,疆吏打电报,说空话,……上下内外如此,焉得不败”。作者进一步分析:李鸿章即使不遭掣肘,可全权经办,他所任用之人也不能实行任事。另外,李鸿章在对日之战中始终不自信,“没有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先存着一种败战的心理,不作准备,不肯牺牲,依赖外人,苟且了事,这是他的过失”。作者对这一复杂的问题的论述虽尽不全面,但他所述之事实,当是客观的。

作者把戊戌变法称为是以自强为目的的民族自觉维新运动,而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国民革命运动,并认为它是民族革命逐步发展的结果。在第十章第三节《民族复兴新方案》中进一步归纳:

我们的民族革命在道光以前,只要把所谓异族的满清政权推翻就够了,他们的文化势力根本不及我们,反逐渐被我们同化。但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局,影响到了东方,列强以科学机械的力量,压迫我们,使我们几次受到打击。民族革命遇到文化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为新对象,其困难更百倍于往昔。这时一般只注意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对于满清政权的问题反而淡然了。鸦片战争后的海防运动,英法联军后的自强运动,甲午战争后的变法运动,都是民族自觉自救的方案。可惜这些方案既不彻底,又不认真的实行,其失败是当然的。不过它们也有一种好处,就是为民族革命做了驱除难的工作,使人民的

新知识,慢慢增加,社会的旧势力,慢慢减少,形成历史渐变的趋势,新思潮就更容易推进。所以庚子拳乱的大反动以后,顽固势力的中心人物,如慈禧太后等也不得不讲求维新了。但民族复兴的伟业,岂是“胶柱鼓瑟”的满清政府所能够担负的?加之日俄战争以后,世人都认为立宪战胜专制,而有立宪政体的要求,清廷既不能适应变局,仍守铃制家奴之政策,一味敷衍,于是国人对于满清的政治改革感觉绝望,方才注意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国民革命运动。

以上这段话,可视为是本书主旨内容的总脉络。作者极为推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而作者在本节中,对三民主义的先进性、优越性以及对中国当时国情的适合性,均有较详细介绍,并予高度评价,这也是本书所侧重内容的最终落脚点。

三

作为“导读”,对此书的某些缺陷也有必要一并指出。也正因为此书以民族革命为主要内容,因而作为清代通史性质的《清史大纲》,在篇幅比例的设计上便显得有些不协调,在总计10章中,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仅有第一章《明清之际》、第三章《大清帝国之盛衰》这两个专章。其第二章《民族革命之酝酿》和第四章《近代之社会与经济》属于专题性质的内容,只是与鸦片战争前有关的史事才予提及,所以清代前、中期的内容显得太薄弱了。另外,由于作者把满汉民族矛盾与中国和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视为同一性质,因而混淆了反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民族运动和国内反满活动之本质,在论述中也不免自相矛盾,乃至有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处。比如将汉族

人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视为是反满民族革命,那么最终将太平军消灭的,是汉族人为主的曾、李之湘军、淮军,这又如何解释?太平军的敌对面仅仅是满族统治者吗?清王朝能够等同于满族统治者吗?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后金汗国与大清帝国》中,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先人是明朝建州卫下的小头目,后来的清帝隐讳这一史实,而称本族为“满洲”,作者又进一步说:“中国人被他骗了二三百年来,现还有许多不明的事实的,以为有什么满族,其实女真人早就被同化了,充其量不过剩下爱新——即金——一姓而已,这能叫做‘满族’吗?”这里,作者又否定了满族的存在,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否定了自己以“满清”为“异族”,把“满清”作为“民族革命的对象”等等论述。

作者对于某些史事的评述也有偏激、过甚其词之处,如第三章《大清帝国之盛衰》对乾隆朝的政绩尤其是经营边疆、统治的深化评价甚低。其第四节《清运之渐衰》称乾隆“南巡东幸,纵欲败度,结果是民穷财尽,官逼民反,而天下大乱了”。按南巡虽耗费国家资财,但当时财政最大支出是所谓“十全武功”的军费,总计达1.5亿两白银,而清王朝由于当时盛世财政库存的积累,至十全武功即将结束的乾隆五十五年,国库存银尚达八千万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赋额》),怎能谓“民穷财尽”?乾隆帝6次南巡至乾隆四十九年结束,其劳民伤财也主要是江南地区,而官逼民反的白莲教起义是乾隆六十年嘉庆初年爆发于西南的川楚陕三省,非全国性的“天下大乱”。

作者在史实的叙述上,也有不严谨之处,如以传闻作史事:第三章第一节《康雍乾三朝之政治》述“隆科多因与皇四子胤禩合谋易‘十’为‘于’字,因得立,就是雍正帝”。第三章